

吴强:留下《红日》照人间

● 马信芳

1982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巨鹿路675号,当时上海市文联与作协一起办公。作为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和党组书记,吴强老师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一本被誉为“十七年”红色文学经典之一的大作,从初版到“文革”前夕的8年中再版印刷44次,共出版发行180多万册。现在能在办公室里近距离地看清自己的偶像,真是高兴。

这是工作的第二年,受明天出版社《登上文坛之前》丛书之邀,吴强老师接受了我的采访要求。我来到复兴西路34号卫乐公寓,走进了这个作家之家。吴强老师丝毫没有架子,在他的书房,我随着他的回忆,飞入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1933年,吴强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作为苏中军区政治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的吴强,亲历了第二次涟水战役与莱芜、孟良崮、渡江等著名战役。

1947年5月17日,亦即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吴强在驻地的村口,亲眼目睹了不可一世的张灵甫这位国民党将军最终却躺在一块门板上被解放军战士从山上抬下来的情景。从那一刻起,他心中就萌发了一个念头:要把涟水战役、莱芜大捷到张灵甫毙命孟良崮,这些“和人物都很贯穿的故事”编织起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这个创作的冲动难以遏制地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他曾考虑,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编写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不受史实限制。但细一想,因为莱芜、孟良崮战役本身就是战争中的艺术精品,透过这些史实,描写塑造人物,写就光彩的战斗历史。战争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作品的许多内容应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然而,部队每天都在行军打仗,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作。

新中国成立后,吴强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1952年转业到地方,任华东军区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副处长、中

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共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等职,要把书写出来,不仅是他的愿望,而且是他的战友和老上级的希望。五十年代,吴强完成了8万余字的《红日》故事梗概和人物简表。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带着《红日》里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和一大皮箱资料躲进了招待所开始构筑这项浩大的工程。

在他的屋里,桌子上和沙发上堆满了各种写作资料和中外军事名著,面前的稿纸越堆越厚,他的写作情绪在猛烈地高涨,某些未来篇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亢奋中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向笔下聚拢。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一直持续了4个月,才圆满地画上了句号。可他的体重却由74公斤下降到58公斤,甚至到了虚脱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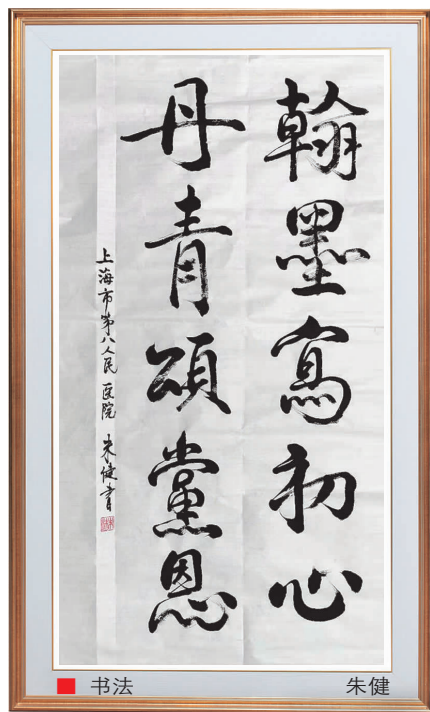
1957年4月,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审定,《红日》被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同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作品正面展开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宏伟画面,激越、壮丽,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热情。反映了我军由弱到强,最终胜利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人民战争的规律,形象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敌我双方人物,尤其是高级将领典型性格的刻画上,有很大的突破性。对于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十七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收获之一。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战争小说,尤其是具有史诗性质的宏大叙事的战争小说创作始终不尽如人意。虽然从辛亥革命至1949年,期间更有民族自强的抗日战争和波澜壮阔的国共战争,但没能出现《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宏篇巨著。整个“十七年”时期,虽然出现了大量战争题材的小说、电影、戏曲,但基本都局限于规模很小的题材范围,让人们根本无法感受到那种大战的铁血之气。

所以,这期间只有吴强的《红日》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题材上有一定的突破,尝试从全景式的角度对战争进行整体

式的描写,虽然限于时代局限,这种全景式的尝试不能算很成功,但其立足点已经远远高于大部分同时代的类似题材作品了,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红日》的升起是当代中国战争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红日》震撼了中国文坛,全国为之轰动。1961年,《红日》先后被译成英、法、俄、日、德等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美的遐想

● 郑芬芳

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快乐。

曾有一次看到有个骑电动车的人,头不自觉地偏看路边一壁一壁的蔷薇,突然觉得这个人的心里一定很安定、平和。

美好的心神,需要以美来滋养。

然而前提是,我们愿意捡起地上的落花闻。

一次在书中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初夏风起的季节,独自去山里走动,那里有片很大的竹林。每当风来,竹枝就一个劲地往一边甩,纤细的叶片划过天空,拖出飒飒的声响。

这个人也呆呆看了好久,风止又

满江红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中华新韵)
● 逯俊生

遥想当年,
山河破、国殇民惨。
石库里、点燃星火,
曙光初见。
步履艰辛寻大道,
三山除尽驱倭乱。
荡浊尘、重整旧山河,
红旗展。

星斗转,寒暑换。
何所惧,风云变。
守初心使命,
神州同念。
薄雾岂能遮望眼,
昆仑巍奕谁能撼。
中国梦、共谱复兴章,
天行健。

桂荃苑

刊头书法 瞿国平

起,叶停又动。后来时隔多年,生活越来越忙,工作越做越大,人越来越累,然而他说:“心里总是响起这个声音,看风去,看风去,只是看风去。”

他不知道那次的投入,变成了一种慢慢的滋养,让他的心里不只有工作、赚钱、赶路、刷手机,也曾经为美感动过。

就像康德说:“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快乐。”只要留心,感动的因子就会悄悄发生。

也许城市总是忙碌扰攘,而之所以不会使每个人都会为它的无情而冷漠,大抵因为生活有草木飞鸟花朵昆虫,因为某一个瞬间的为美感动,变成了一种心流,注入我们心中。

在粗粝的生活之外,美是我们前行的力量。

红色弄堂

(节选)

作者 张晓栋

HONG SE LONG TANG

在北京西路、北成都路(今成都北路)、山海关路、大通路(今大田路)围成的地块中,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弄堂,丽云坊就在其中。这一片是传统的石库门居民区,不仅有菜场、煤栈等生活基本设施,而且交通十分便利,去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非常近。丽云坊的弄口在成都北路741弄,弄内套弄,还有一条叫平安里的小弄堂。从丽云坊向西,穿过直弄大兴坊,可至大通路,向北有聚兴里,向南可至北京西路。1928年至1931年,丽云坊54号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地。54号就在与平安里平行的小支弄里的第二个门牌号,是一幢两层楼的石库门,与大弄隔着80—84号这一排房子。

大革命失败以后,各地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都来上海千方百计地找党中央,需要辨别厘清的情况很多,所以组织部的工作尤为艰巨。周

恩来在中共六大以后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就在丽云坊54号办公。他经常在工作之余同来找组织的同志谈话,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分配任务,同时了解各地的情况,逐步恢复中央和地方的组织关系。当时,中央组织部人手很少,只有十来个人。于是,恽代英和沈葆英被党中央调到上海。其中,恽代英接替余泽鸿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工作。为了保密,机关内的人员对外都是房东、房客的关系。中央组织部组织干事黄玠然和他的夫人、中央组织部机关交通员杨庆兰是房东,其他人都是房客。黄玠然化名杨天生,恽代英化名王作林。由于周恩来身兼数职,丽云坊54号内的具体工作大多由恽代英负责。1929年10月后,由于恽代英赴福建等地检查、指导当地党的工作,就由巡视青岛、满洲工作后

回沪的陈潭秋接替恽代英负责处理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

当时,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担任机关的机要员。由于儿子刚刚出生,沈葆英不得不一边照料小孩一边做好工作,包括用药水抄写文件、管理重要文件。有时,她还要化妆成富家的少奶奶、阔太太或扮成普通的妇人,来往于交通路上传递文件。邓颖超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支部书记,经常到丽云坊54号检查保卫工作,楼上楼下都看得很仔细,特别要看窗口的暗号放得对不对,会不会被敌人发觉。她每次都是从天井穿过灶披间走到后门,仔细查看,再三叮嘱。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捕叛变后,除了恒吉里,其他他所知道的大部分秘密机关都撤退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此时撤出丽云坊54号。

丽云坊今已不存。

丽云坊,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

——中共中央组织部遗址